

# 法兰克福学派与伯明翰学派社会和理论生成语境比较研究

高源

(云南大学文化发展研究院, 云南 昆明 650032)

**摘要:** 法兰克福学派以社会批判思想著称, 其对文化的关注开始于20世纪30年代, 以批判传统的马克思主义为出发点, 吸收了精神分析理念, 对大众文化进行了彻底批判。而伯明翰学派却以大众文化研究而著名, 其建立以来, 逐步开始研究工人阶级、亚文化群体和大众媒介等问题, 研究视角从文化精英主义过渡到大众文化。产生这种文化研究分歧的原因是二者社会与理论生成语境存在差异。因此, 基于法兰克福学派和伯明翰学派的历史背景与主要人物观点, 通过分析其社会和理论语境, 得出同中有异的社会背景下, 二者的主要理论来源大相径庭, 影响了各自的文化研究方向的结论。

**关键词:** 法兰克福学派; 伯明翰学派; 社会生成语境; 理论生成语境; 文化研究

**中图分类号:** G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4735(2018)02-0062-08

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思想和伯明翰学派的大众文化研究都对文化研究理论产生了重要影响。当下学术界单独对法兰克福学派或伯明翰学派的研究较为普遍, 有许多成果值得学习与推敲<sup>①</sup>, 但对二者的比较研究略显单一<sup>②</sup>, 大都从二者的核心观点或理论转向进行比较, 而从两个学派诞生前后的社会和理论背景来比较研究的极少。比较法兰克福学派和伯明翰学派形成的社会背景和理论来源, 明晰二者文化研究伊始的不同方向, 是文章的核心所在。

## 一、法兰克福学派与伯明翰学派概述

法兰克福学派以马克思主义为研究导向, 在坎坷的历史进程中形成了社会批判思想。伯明翰学派是基于批判传统马克思主义的视角, 在多种理论的交相辉映之下, 打破了文化精英主义与大众文化的隔阂, 开始探索文化与大众的互动关系。下面对二者的发展历程及其思想做一概述。

### (一) 法兰克福学派

1923年2月, 德国法兰克福大学建立了社会研究所, 在第一任所长卡尔·格林贝格(Carl

**收稿日期:** 2017-12-18

**基金项目:** 本文系云南大学笹川优秀青年教育基金资助项目“法兰克福学派与伯明翰学派的文化研究之比较”(项目编号: 16KT210)之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高源(1993—), 男, 山东淄博人, 硕士研究生。

Grunberg) 掌门期间并没有产生影响后世的法兰克福学派理论成果。直到 1931 年初, 马克斯·霍克海默 (Max Horkheimer) 接任所长, “他在题为《社会哲学的现状和社会研究所的任务》的就职演说中, 主张建立对不是作为个人, 而是对作为社会成员的人的命运进行哲学解释”的社会哲学。<sup>[1]6</sup> 当时德国的政治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 德国对以绝大多数研究所成员的犹太人实施了驱逐政策, 使得研究所工作无法继续, 他们先后迁往美国哥伦比亚、加州等地, 直到 1949 年后, 受德国联邦政府的邀请, 才重新回到法兰克福大学, 部分学者仍留在美国继续从事研究。关于思想建设, 社会研究所创办的《社会研究杂志》收入该学派学者的诸多文章, 形成了完善的批判理论体系。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 后继者们对于法兰克福学派形成的批判理论出现很大分歧, 如施密特 (Alfred Schmidt) 继续保持该学派原有的批判理论思想, 而哈贝马斯 (Jurgen Habermas) 认为批判理论已经不再适应 70 年代以来的社会, “他逐渐放弃了对社会的否定性批判, 更多地关心生活质量、人权、生态问题、个人发展以及参与社会决策的公平机会等, 他把自己的学说叫做‘激进的改良主义’。”<sup>[1]14</sup>

法兰克福学派对文化的关注开始于 20 世纪 30 年代, 基于对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批判, 以精神分析为借鉴思想, 对德国纳粹社会和美国流行文化进行了解读和研究, 主要针对纳粹党通过媒介对大众进行统治者至高无上的思想的单一灌输、资本家为谋利而对艺术品的批量复制生产、受众无条件接受大众文化产品等方面的现象, 进行了强烈批判。

## (二) 伯明翰学派

伯明翰学派成立于 1964 年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 最初, “中心主要是以科研和研究生培养为主, 主要目的是研究当代文化及其与社会和社会变迁的关系”<sup>[2]22</sup>, 研究中心的第一任主任理查德·霍加特 (Richard Hoggart) 升华了 F.R. 利维斯 (F.R. Leavis) 的文化精英主义, 开启了关于“文化与社会”方面的思想潮流。研究中

心的核心人物雷蒙德·威廉斯 (Raymond Williams) 带领该学派走向了工人阶级与大众文化研究。后来, 霍加特离开了伯明翰大学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任职, 斯图亚特·霍尔 (Stuart Hall) 接任研究中心主任工作, 到 1979 年离任时, 研究中心培养的硕博士已多达 40 人, 他与约翰·费斯克 (John Fiske) 等学者逐步将文化研究深入, 坐实了伯明翰学派大众文化研究的理论思想。到二十世纪末, 由于中心人员、资金、体制化发展等问题越加严峻, 迫使研究中心面临关闭, 大众文化研究思想走向暗淡。

伯明翰学派的文化研究是对工人阶级生活、社会表象、大众媒介等与文化有关问题的关注, 表明了文化的大众化、流行化是时代进步的必然趋势。伯明翰学派继承了法兰克福学派和利维斯主义的传统批判思想, 极力关注底层工人阶级社会生活模式, 对大众文化进行了深刻解读, 是当之无愧的文化研究鼻祖。

两个学派的文化研究在今天看来, 都对文化产业理论与实践的研究有重要意义, 值得注意的是二者的理论有很大区别, 需要对产生这种差别的原因进行分析, 其中一个视角, 即是从历史维度切入社会背景。

## 二、法兰克福学派与伯明翰学派社会生成语境的异同及其影响

研究理论思想的第一步即要得知这一理论为何产生, 首要方法是追溯该理论诞生的社会语境。比较法兰克福学派和伯明翰学派文化研究社会生成语境同样适应这一原则, 从而厘清二者文化研究观点因社会语境的差异而有所不同。

### (一) 同中有异的社会背景导致两个学派研究方向的差异

工业革命带来了社会经济的革新, 是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伯明翰学派所在的英国是世界上最早进行工业革命的国家, 工厂替代了手工劳动, 生产要素实现了新的配置。法兰克福学派所在的德国也在十九世纪中期进行了工业革命, “短短的 20 年间, 工业生产增长了一倍半, 其中, 棉花消费量增加 3 倍以上, 煤产量增 4 倍,

钢产量增近2倍，铁产量增5倍半，德国迅速成为了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sup>[3]</sup>总之，工业革命创造了巨大生产力，带来了社会 and 产业结构的变化，从而构成了两个学派诞生的一个共同的时代背景。

虽然两个学派都诞生在工业革命这一大时代背景下，但二者形成的先后顺序不同，与文化研究背景有关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活也存在差异。1930年前后，世界经济危机袭来，德国阶级斗争日趋尖锐，工人运动不断分裂，纳粹党凭借广泛的群众基础攫取政权，德国进入了法西斯专政时期。在白色恐怖的烘托下，希特勒集党、政、军权于一身，为了维护纳粹党的生存利益，扩军备战、控制经济、迫害少数民族成为他即刻的行动。霍克海默、阿多诺（Theodor Wiesengrund Adorno）、本雅明（Walter Bendix Schoenflies Benjamin）等具有犹太血统的法兰克福学派学者同样面临危机，为了逃避纳粹迫害，1934年5月，霍克海默决定将研究所总部迁往哥伦比亚大学，对德国纳粹政治经济进行全盘批判。法兰克福学派批判思想是从纳粹掌权开始的，反犹太主义和爱戴德意志民族使得群众心理获得极大安慰，希特勒作为一个十足的演讲家，加之广播、黑白电视的辅助宣传，德意志群众几乎都成为了希特勒的狂热拥趸。为此，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观点是理性德国变得徒有其表，德意志群众完全丧失主观能动性，开始深度批判纳粹思想和资本主义工业体系。

伯明翰学派形成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活与法兰克福学派不同，二十世纪中期的英国政治稳定，经济不断发展。伯明翰学派成立之时，英国从上到下都处于大量积累资本的经济运行中，工业革命为产业发展带来更多新的技术，电视之父贝尔德（J.L.Baird）在1924年制作出了彩色电视机，瞬间风靡于整个西方发达国家，传媒技术的更新造成文化商品更加具有规模化，美国好莱坞电影、肥皂剧等商业文化产品在欧洲生根发芽。这也使得工人的生活发生质的变化，机械发明归根到底改变了工人的生活，加上社会福

利政策的巩固提升，工人的双手闲置下来，开始适应美国以媒介为主的大众文化生活，普遍富裕、追求快乐成为工人阶级的生活特点。此时，文化研究关注的焦点是工业生产中引入了以电子设备为载体的新兴技术与美国大众文化产品的盛行，这种发展趋势继续推动了原来工业生产的速度与规模，伯明翰学派开始关注这一系列的社会现象的变化，向大众文化研究领域探索。

总之，虽然两个学派都形成于西方工业革命的大背景之下，但法兰克福学派成立的时间比伯明翰学派早40年左右，不同时期的两个国家所处的社会背景有很大差异，造成了他们研究方向的不同，前者批判纳粹思想和资本主义工业，后者积极关注大众文化，从而使得两个学派后续的思考对象和总结规律也鹤长凫短，深刻影响了各自学术观点的形成与发展。

（二）不同的社会问题都引发了两个学派对文化的关注

作为知识分子，处于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和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研究场域，社会上的任何变化都牵动着他们的心。工业革命造成的物质生产过度发展，没有考虑社会良好运行的充要条件，一战后的德国和二战后的英国存在的社会问题不同，但最终都走上了对文化问题的关注。

法兰克福学派成立时，社会的动荡不安使得许多知识分子在一战前认为的不可实现的政治正走上历史舞台，一种形而上的政治理念卷土而来，有学者认为：“目前越来越恶化的社会境况可以通过变革加以改变。”<sup>[4][6]</sup>此时，出现了一批政治上十分激进的知识分子，这批知识分子包括“社会研究所主要创建人：马克斯·霍克海默和弗里德里希·波洛克（Friedrich Pollock）”<sup>[4][7]</sup>。费利克斯·韦尔（Felix Weil）积极关注社会变化，与从事评论批评的艺术家们共事，说服其父亲出资建立研究所，到霍克海默接管时，法兰克福学派对文化社会的批判崭露头角，此时研究所的研究方向主要是社会哲学，探究对象是“整个人类的全部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sup>③</sup>；任务是分析社会现实，

研究“社会的经济生活、个人的心理发展与文化领域里的变化之间的关系”<sup>③</sup>。逐渐摆脱了庸俗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以批判社会与研究文化为宗旨的法兰克福学派登上了历史舞台，文化问题受到学派学者的重点关注，这种关注缘起于该学派眼中德国文明理性的丧失，加上美国流行文化的蓬勃发展。总而言之，工人阶级革命被资产阶级完全压制，统治者希望经济稳定而迫切实行国家调控的政策。垄断资本主义政治越加深化，加剧了人心异化和社会物化等问题的出现，人们不再追求高雅艺术，大众所接触到的审美是低级审美，变成了同质化的低俗，学者们的研究思维转向了对资本主义现实的“批判”。

与德国纳粹政权的国家垄断相比，伯明翰学派所处的英国社会相对安定，主要问题是经济的迅速发展造成了工人阶级社会生活方式的变化，仅仅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社会学的研究范畴不足以解释当时的社会存在状态，学者们转向了对社会生活方式的探索，从而诞生了伯明翰学派文化研究中心。伯明翰学派对社会现象的观察考虑较为细致，在社会混乱、道德秩序失衡的基础上，随着美国文化的入侵，广播、电影、彩色电视机等电子信息和传输技术的不断深化，社会底层民众对这类休闲娱乐文化的接受并无阻碍，英国本土文化面临挑战，瞬间让知识分子的研究方向变得模糊。威廉斯以文化是“整体的生活方式”“文化是普通的”论断，把文化从少数人手里夺取了过来，放在了普通大众的手中。<sup>[2](18)</sup>威廉斯把所有人看做一体，不拘泥于高雅文化和大众文化之间的差别，试图将二者融合。伯明翰学派的研究者从社会安定出发，辩证否定经济决定论，重视工人阶级在社会中的作用，可谓是伯明翰学派诞生了新的研究视角。

德国和英国诞生的两个学派的社会语境有所不同，但结果都是为改变当时国家社会的不和谐状态而进行的对社会和文化的初步研究。法兰克福学派在一战后政治动荡情况下选择了共产党，追求国家理性、公民幸福的愿望成为社会研究所的主题，在批判纳粹德国的背景上，开始用批判

思想审视大众文化。伯明翰学派处在工业向后工业时代过渡的英国，研究者们试图把握资本主义和工人阶级在社会中的和谐度，以工人阶级的视角逐步打破精英与大众文化界限的文化主义研究。异中有同，两个学派所关注的文化问题成为各自研究的共同特点。

### 三、法兰克福学派与伯明翰学派的理论生成语境的异同及其影响

文化研究有多种视角，如“人文学者常常研究作为艺术或智力活动的文化”<sup>[6](4)</sup>，“人类学家与社会学家考察的则是作为‘生活方式’的文化”<sup>[5](9)</sup>。他们的研究视角也来自于不同的理论背景，人文学者的文化研究理论背景是哲学、文学、艺术学等；人类学和社会学家的理论背景当属人类学、社会学。而法兰克福学派和伯明翰学派都是文化研究的重要学派，两个学派的社会语境同少异多，其各自理论来源必然大不相同。法兰克福学派和伯明翰学派之所以在文化研究领域产生了某些影响，最主要的是来自于各自的代表人物，他们的理论来源能切实反映出学派观点的理论生成语境，这里主要以法兰克福学派的霍克海默、阿多诺、弗洛姆（Erich fromm）、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和伯明翰学派的霍加特、威廉斯、霍尔的理论来源为主进行梳理与比较。

#### （一）马克思主义是两个学派文化研究共有的理论来源

法兰克福学派从成立到解散的整个过程中，学者的学科背景多样，但大都继承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卢卡奇、柯尔施的“批判的马克思主义”的传统，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进行了综合性的研究和剖析。伯明翰学派诞生时的英国社会已经走上了反对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之路，这与二战之前英国著名的马克思理论批评家克里斯托弗·考德威尔（Christopher Caudwell）偏教条的马克思主义是相对的，但伯明翰学派终究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建立自己理论话语体系的基础。

批判传统马克思主义是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基础。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创建初期，霍克

海默的研究从心理学转向了哲学，1925年，他论述康德的著作取得大学授课资格，开始讲述黑格尔和康德的课程，从而大大吸收了康德和黑格尔的哲学思想，1931年，霍克海默正式成为研究所所长，与前任所长不同，他不是简单地给自己贴上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标签，而是用批判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来观察当前形势，把个体作为社会理论的基础，提出了“研究工人和受雇者对德国和发达欧洲其他地方各种事件的态度”<sup>[6](33)</sup>，对个体与真实的社会现实进行研究，紧张的社会秩序需要理性的思维加以判断，这明显地体现了他对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实证主义的批判。阿多诺正式加入研究所是1938年，早年沉醉于古典音乐和美学的他也学习了康德的《纯粹理论批判》，增加了综合哲学和社会学洞察能力的学术研究，完成了《论胡塞尔现象》的博士论文。阿多诺反对本体论和同一性，也拒绝实证主义，崇尚辩证法，主张批判既是对已有问题的辩证看待，终其一生始终不渝地站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立场对资本主义的文化工业展开激烈的批评，“吸收了马克思主义的否定的资本主义理论、异化劳动、人道主义、人是实践的存在物、人的劳动本质。”<sup>[7]</sup>霍克海默与阿多诺基本秉持着批判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继承了马克思的劳动异化学说，也发展了卢卡奇的物化理论与辩证法思想，追求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是对资本主义、纳粹思想、实证主义、商品拜物教进行深刻批判的理论基础。

反对经济决定论的教条式马克思主义是伯明翰学派对工人阶级文化关注的理论前提。二战以后，英国社会实施福利政策，工人阶级的激进主义慢慢消退，社会主义革命稳步不前，国家总体的战略方向仍然是经济决定论，学术界的教条主义也顺应发展，考德威尔对无产阶级艺术的本质理解有了明显的教条主义，虽然他强调阶级的群体经验，但认为艺术始终不可能普及工人大众，反对滑稽荒唐的流行音乐、电影和小说，由此引发了威廉斯的关注，他针对考德威尔在《幻想与现实》中大部分讨论的含糊不清，对其教条主义倾向进行了批判。对于伯明翰学派知识分子来说，

马克思主义“既是他们的知识基础，却也是他们所要批判的”<sup>[2](41)</sup>，这一思想可谓伯明翰学派文化研究理论的最初方向，反对教条是该学派学者深入底层工人阶级的指向标，是对文化精英主义革新的重要理论思想。

## （二）精神分析思想巩固了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

德国革命失败的情况下，社会研究所试图引入心理分析，也是挣脱传统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标志。弗洛姆是法兰克福学派精神分析思想的重要人物，他成长于宗教气氛中，坚持一种哲学人类学的思想，十分强调马克思《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人类学的含义，其思想没有离开过弗洛伊德主义。法兰克福学派所主张的是马克思的异化，这与弗洛姆的人类学含义志同道合。霍克海默基本赞同弗洛姆的观点，并“写了‘历史与心理学’一文，提到了用心理分析补充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紧迫性。他认为当代社会中的动机必须被理解为马克思和心理分析双重意义上的‘意识形态’”<sup>[6](119)</sup>。当然也伴随着对弗洛伊德主义的思辨，霍克海默否认“资产阶级成分是无可争辩的遗憾”这一思想，他认为没有思想家能够完全逃避他的社会起源；弗洛姆强调弗洛伊德的盲点，即忽视对家庭作为社会代理人的作用，反映了弗洛伊德对现代生活中家庭没落的敏感；阿多诺考察了修正主义者对弗洛伊德本能理论的攻击，在《最低限度的道德》中，以一句话表达了这些：“精神分析中只有夸大是真实的”<sup>[6](125)</sup>，对修正主义做了极力的批评。马尔库塞去往美国之后也开始考察有意义的社会变革道路上的心理问题，后来《爱欲与文明》的出版，远远超过了之前批判理论调和弗洛伊德与马克思主义的努力，在心理分析上做足了研究，也重复了阿多诺对修正主义完整人格的攻击，成为调和弗洛伊德和马克思的预言家。通俗地讲，学者们利用精神分析法分析出了法西斯专制主义用控制群众心理而达到极端控制整个社会的目的，从而理解了资本主义工业社会的纳粹同谋即群众完全丧失理性的原因，即受到了纳粹精神思想的洗刷。弗洛伊德思想成为法兰克福学

派批判思想的基石。

(三) 英国传统文化主义、结构主义和霸权理论落实了伯明翰学派大众文化研究理论

伯明翰学派文化研究的初衷是分析西方社会在后工业时代的社会危机问题, 纵观西方社会的发展与学者的研究方向, 伯明翰学派形成的社会氛围与理论来源复杂多元, 但研究方向是在现实社会发展的情况下本着和谐的理念走出一条文化道路。

英国传统文化主义是伯明翰学派的理论来源。英国传统文化主义思想是从马修·阿诺德 (Matthew Arnold) 开始产生的, 其文化是“完美和智慧”的思想表现出强烈的精英主义倾向, 以精神、心灵的美作为文化的本质, 通过文学作品表现出来, 以期教化民众。二战后, 英国经济迅速发展, 报纸、音乐、电影、广播、电视等走进大众视野, 大众文化蔓延开来, 以阿诺德为代表的推崇文学研究的学者, 认为这种大众的文化现象和文化产品都是机器生产出来的, 给人们的教化远不如对文学作品的阅读。因此, 伯明翰学派思想形成之前是在一种精英主义视角下, 对文化产品批量生产进行批判, 这与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思想有异曲同工之妙。

但是, 伯明翰学派形成之前的传统文化主义对精英主义的推崇并没有影响到大众文化的蔓延, 大众文化正在向文化生活主流方向发展, 以阅读教化人们的意念难以实施, 英国传统文化主义理论遭遇瓶颈。该学派在探寻工人阶级生活时, 对英国传统文学研究实现了突破。霍加特在其著作《识字的用途》中, 首次提出了“文化研究”的理论雏形。<sup>[8](25)</sup> 整本著作分两部分, “旧秩序”是写 20 世纪 30 年代其童年时代工人阶级的文化, 是一种田园诗般的美学传统的表现, 工人阶级把艺术视为享受; “新秩序”是写 20 世纪 50 年代, 因美国通俗文化的传播, 大众娱乐使得人们的生活浅薄滑稽、枯燥乏味, 打破了工人阶级原有的生活的美, 道德严肃性面临丧失, 两部分内容是充实富足与浮夸世界的对立, 他试图打破精英主义的文本控制思想, 对二战后的大众文化保留期

待, 形成一股颠覆英国传统文化主义的文化思潮。霍加特的工人阶级文化与利维斯的精英主义不同, 美好天真的工人阶级文化已经成为过去, 这明显体现出他在利维斯主义的基础上前进了一大步。正如霍尔指出的那样: 尽管霍加特摒弃了许多利维斯所坚信的文化价值观, 但他仍然采用了利维斯式的文学批评的方法来研究文化, 这就等于在探索和实践延续并改良了利维斯主义的“传统”。<sup>[9](53)</sup> 在大众文化铺天盖地的现实下, 一味地强调文学作品的传播并不能解决精英与大众的隔阂, 而伯明翰学派的突破就在于逐步打破精英和大众的界限, 从工人阶级文化中逐渐找到了精英主义和大众文化的相通之处。

这种相通之处就在于威廉斯秉持着“情感结构”将精英主义文化过渡到工人阶级现实生活研究。“情感结构”是人们在特定地域、特定时期生活的普遍经验, 它需要通过特定的物质载体被人们意识和交流。<sup>[10](65)</sup> 如此, 威廉斯彻底突破了英国传统文化主义, 开始关注工人阶级的文化生活, 其著作《漫长的革命》是以工人阶级为主线, 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在经济基础、物质生产和社会生活, 注重从人类日常生活角度来理解文化, 创造出新的传统文化主义文本与社会生活的紧密联系。威廉斯认为, 文化研究者必须要保持清醒, 明白所谓文化传统不但是现在的人对昔日文化的一种选择, 更是现在的人对昔日文化的一种解读。<sup>[9](57)</sup> 这里的解读可以说是一种日常生活的体验。伯明翰学派学者大都处于工人阶级家庭, 本着工人与平民阶级的立场提出建立一种能够代表他们的政治、文化权利的话语替代之前传统文化主义倡导的精英文化。

伯明翰学派后期的理论是从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开始的, 并转向了葛兰西的霸权理论。继承创新了英国传统文化主义理论之后, 伯明翰学派的文化研究走上正轨, 吸收了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理论, 其核心是多元决定论和意识形态理论。阿尔都塞反对马克思的决定论, 主张社会是由经济、政治、文化、意识形态等交替起第一位作用而共同构成的, 提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理论, 这

与后来葛兰西强调的资本主义统治的霸权一致，“但在阿尔都塞那里，在他把市民社会划入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之后，大众反抗的积极性乃至可能性被消解了”<sup>[2](51)</sup>，这一困扰被葛兰西的霸权理论弥补了，葛兰西的霸权理论除了资本主义统治霸权的国家理论之外，也包括从属者的反霸权理论，这正是伯明翰学派从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过渡到霸权理论的关键点，在具体分析社会现实中，逐步寻找到关于突破现实、反抗霸权的路径，与伯明翰学派的底层工人阶级反抗精英文化与选择通俗文化相契合，为伯明翰学派的大众文化、受众、编码解码等研究做出了理论贡献。在批评、创造和注重工人阶级的日常生活中，伯明翰学派形成了独有的理论思想。

总之，法兰克福学派和伯明翰学派理论来源同少异多，基于反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法兰克福学派支持卢卡奇的物化理论，因社会现象的极端导致了学者们对精神分析的引用，逐步确立了对资本主义体系中大众文化工业体系的极度批判。而伯明翰学派从批判英国传统文化主义出发，确立了特有的文化主义研究范式，在扬弃了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基础上，吸收了葛兰西的霸权理论。从而，文化研究对象也完成了由工人阶级到媒介再到亚文化、女权主义、性别研究等视角的过渡。

#### 四、结语

法兰克福学派与伯明翰学派的文化研究对当下文化产业研究提供了深刻的理论依据，探源二者的文化研究背景，对文化研究理论具有前瞻性和引导性。本文对两个学派的社会语境和理论来源进行了梳理与比较，总结了二者文化研究方向的差异。对于社会语境的比较，一是历史现实的异同，双方在工业革命这一相同背景下走出了不同的经济、政治和社会路线，成为不同倾向文化研究的主要原因；二是主要人物的关注点不同，法兰克福学派学者的出身几乎都是商人，而伯明翰学派学者的出身却大多是工人阶级，二者对社会与文化问题的关注也呈现了阳春白雪与下里巴人的不同视角。因此形成了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

文化工业和伯明翰学派的注重工人阶级文化生活的不同研究思路。对于理论来源的比较，一是相同的理论渊源，二者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共同指导下，批判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贯穿其中；二是不同的理论思想，法兰克福学派重点继承了精神分析思想，而伯明翰学派在革新英国传统文化主义的基础上借鉴了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并吸收了葛兰西的霸权理论。由此，同少异多的理论渊源指明了两个学派文化研究的不同研究方向。然而，本文对法兰克福学派和伯明翰学派文化研究背景的比较探讨尚单薄，要想进一步完善文化研究的理论框架，还有待进一步深入与提高。

注：

- ① 学界对法兰克福学派的研究中，有陈振明的《工具理性批判——从韦伯、卢卡奇到法兰克福学派》（《求是学刊》1996年第4期）；邵培仁，李梁的《媒介即意识形态——论法兰克福学派的媒介控制思想》（《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1期）；俞吾金的《批判理论的界限——对法兰克福学派主导思想的反思》（《探索与争鸣》2014年第12期）等。对伯明翰学派的研究中，有黄晓武的《文化与抵抗——伯明翰学派的青年亚文化研究》（《外国文学》2003年第2期）；胡疆锋，陆道夫的《抵抗·风格·收编——英国伯明翰学派亚文化理论关键词解读》（《南京社会科学》2006年第4期）等。以上研究成果均为单独对两个学派的研究。
- ② 学界对法兰克福学派与伯明翰学派的比较研究中，凯尔纳（Douglas Kellner）的《法兰克福学派与英国文化研究的错位》最为典型，探讨了法兰克福学派和英国文化研究之间的关系。在国内方面，有文章探讨了二者之间的异同，如马驰的《伯明翰与法兰克福：两种不同的文化研究路径》（《西北师范大学报》2005年第2期）；张平功的《批判理论：从法兰克福学派到英国文化研究学派》（《学术研究》2001年第7期）；孔令华的《论媒介文化研究的两条路径：法兰克福学派和英国文化研究学派媒介文化观差异之比较》（《新闻与传播研究》2005年第1期）；杨兰的《法兰克福学派与伯明翰学派文化批判理论比较研究》（《天中学刊》2014年第5期）等。以上研究成果均对两个学派进行了不同角度的比

较研究。

- ③《法兰克福大学演讲集》，第 37 卷，法兰克福，1931 年，第 3 页。转引自欧同力，张伟. 法兰克福学派研究 [M]. 重庆：重庆出版社，1993，第 6 页。

#### 参考文献：

- [1] 欧同力，张伟. 法兰克福学派研究 [M]. 重庆：重庆出版社，1993.
- [2] 和磊. 伯明翰学派——文化研究的源流与方法 [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
- [3] 庄解忧. 世界上第一次工业革命的经济社会影响 [J]. 厦门大学学报，1985，(4).
- [4] [瑞士] 埃米尔·瓦尔特布什. 法兰克福学派史 [M]. 郭力，译.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
- [5] 陶东风，和磊. 文化研究 [M]. 广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 [6] [美] 马丁·杰伊. 法兰克福学派史 (1923-1950) [M]. 单世联，译，陈立胜，校. 广东：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
- [7] 许静. 阿多诺文化批判理论研究 [D]. 重庆：西南大学，2014.
- [8] [美] 齐亚乌丁·萨达尔. 文化研究 [M]. 苏静静，译. 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14.
- [9] [英] 约翰·斯道雷. 文化理论与大众文化导论 (第五版) [M]. 常江，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 [10] Williams Raymond: The Long Revolution [M]. London: Chatto & Windus, 1961.

##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Social Generation and Theoretical Generation of the Frankfurt School and the Birmingham School

Gao Yuan

(The Research Institute of Cultural Development, Yun Nan University, Kunming 650032, China)

**Abstract:** The Frankfurt school is famous for its social critical thoughts, its focus on cultural began in the 1930s. It criticized the orthodox marxism as a starting point, absorbed the ideas of psychoanalysis, and carried on the thorough criticism in mass culture. And the Birmingham school is famous for mass culture research since its establishment, it gradually began to study the problem such as the working class, subculture groups and mass media. One research angle of view is the cultural elitism to mass culture. The reason for the divergence of cultural studies is that there ar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social and theoretical generation contexts. Therefore, based on the Frankfurt school and the Birmingham school of historical background and the main characters point of view, it analyzes its social and theoretical context. It is concluded that under the same in different social background, their main theories source, affect their culture research direction.

**Keyword:** The Frankfurt School; The Birmingham School; Social generative context; Theoretical generative context; Cultural studies

(责任编辑：田丽)